



南开文博考古论丛

NANKAI WENBO KAOGU LUNCONG

【刘 毅◎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开文博考古论丛

NANKAI WENBO KAOGU LUNCONG

【刘 毅◎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文博考古论丛/刘毅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890 - 7

I. ①南… II. ①刘… III. ①文物—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0. 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49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0年，是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恢复创办后正式招收本科生30周年。三十而立，当时曾经准备举行一些小型的纪念活动，考虑出版一部论文集、编辑一本纪念册，如果条件允许，再开一个规模适中的纪念会。但当年4月，我系在河南省申请的“南水北调”考古发掘项目获得批准，淅川县党子口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于7月开始。这是我系第一次独立承担田野考古发掘任务，为了确保工作质量，几乎所有的骨干教师都投入了全部精力；而此刻恰恰是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启动之时，加之其他一些偶然事件，两者发生了时间和人力上的冲突。在确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后，我们最终选择了重实轻名，全力以赴进行淅川考古发掘，为专业未来的发展夯实基础，以实际工作的成果纪念专业恢复30周年。

这个论文集是当时预备纪念活动的唯一保留项目。感谢历史学院党政领导和学术委员会决定以“985经费”资助本书出版，感谢前任院长陈志强教授为本书联系出版社等辛勤劳动。论文集收集的人员范围，是自1979年以来曾经在本系（专业）任职的教师。文章的排序原则：首先，已归于道山的3位先生排在最前面，以表达对仙逝者的追怀；其次，为已经退休或年过花甲的教师，按年龄序列先后，把老师们的文章放在前面，以表达后学的尊崇和感恩；在岗及已调离但仍在岗的教师，按照学术界习惯，以文章内容的年代序列先后。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部分教师交稿甚晚和出版经费未定），这部论文集的编辑工作曾经几度中断。时过境迁，现在再冠以“30周年纪念”字样似乎不甚合适，但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纪念，不妨立此存照。因为联络不上或其他特殊原因，一些曾任教师的大作未能收入，这是一件憾事；作为补充，将2010年以来新聘任教师的论文一并收入。另外，本系教师程平山博士原先提供了一篇关于晋至隋代

《竹书纪年》考校的论文，校样时应作者要求撤销。

最初征集论文时，为了保证时间，也考虑到退休教师不堪其劳、在岗教师发表论文还要为杂志等级而谋等因素，决定欢迎接收未刊稿，也可以使用公开发表过的文稿，可以是代表作，也可以是因旧作意有所嫌而修改订补者。由于发表时间不一、文章体例不一，还有一些手写稿的文字辨识及资料核对都很麻烦，编辑工作的难度很大。本系刘尊志教授具体负责收集并编辑这些论文，在他的带领下，硕士研究生刘昕、刘舒睿对所有文章的电子化及资料核对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李宝军、赵冉、蒋侍辰、路畅、宋美娟、宋永平、于宏森等硕士研究生也为论文集的编校和图版处理做过不少工作。本书所收论文内容涉及文物与考古学研究、博物馆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多方面，共计 19 篇。

南开大学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文博考古学科的机会，但最终失之交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回国之初、徐苹芳先生大学毕业伊始，都曾经在南开短暂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郑振铎先生、沈从文先生曾向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学者郑天挺教授提议创办博物馆学专业。郑先生高瞻远瞩，在对有关资料进行研判的基础上，意识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机缘，遂决意在南开创办博物馆学专业，并由时任秘书的魏宏运教授书面上报学校批准（魏宏运：《新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专业的创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6 月 4 日）。后又经郑天挺教授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协调，1959 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下设置博物馆专业（当时的名称是“博物馆专门化”），开始招收学员，后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等原因而停办。虽经此蹉跎，南开前哲并没有忘记使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 1979 年秋，在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天挺教授、历史系主任魏宏运教授的积极组织推动下，正式恢复组建“博物馆学专业”，隶属历史系；由著名历史学家、文物博物馆学家王玉哲教授任专业主任。1980 年夏季正式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此后，1984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是 1952 年大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全国同类专业中创办最早的，2001 年改名“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隶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 年，为反映学科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为适应一级学科调整的需要，改名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博物馆学专业恢复建立之初的师资队伍，由原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部分教师以及一些文博单位的业务骨干组成，王玉哲、傅同钦、张锡瑛、梁吉生等教师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奠定了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基本研究体系，并开始注意选拔和培养青年教师；朱凤瀚教授、傅玫教授相继主持本专业，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先生、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史树青先生、俞伟超先生，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等著名学者先后受聘为本系兼职教授，为我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开考古博物馆学科师生永远铭记这些前辈们的功德。

30 余年来，我系为全国文物工作系统培养了上千名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进修生在内的各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文物考古研究或文博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骨干，为我国文博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0 余年来，本系教师结合教学实践，在文博考古科研领域中做出了很多成绩，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部委和省级科研项目，其中对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考古学及古代文物研究、理论博物馆学研究等方面，在全国具有比较大的影响。经过 30 余年的不断探索和修订，建立了科学完整的本科、研究生教学课程体系，为兄弟院校文博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借鉴。

回首过去，本系曾经有过辉煌，也走过一些弯路，甚至曾经错过了一些关键性的发展机会。但无论如何，最低谷已经甩在了后面。从善如登，不管前途怎样艰难困苦，我们都将继续努力，精诚团结、奋然前行。

刘毅

2012 年 10 月 6 日

目 录

鬼方考补正	王玉哲 (1)
试论藏品的搜集、管理、研究、利用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 ...	马子庄 (9)
略论西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	冯承柏 (13)
吉祥如意之纹饰与绘画摭谈	傅同钦 (29)
论陈列形式的构成与设计	刘岱良 (38)
试论东北地区先秦铜镜	张锡瑛 (47)
中国博物馆的骄傲	
——关于张謇及其博物馆的随想	梁吉生 (65)
河西的犁	傅 玫 (74)
师酉鼎与师酉簋	朱凤瀚 (84)
大南沟石棚山墓地研究	陈 畅 (99)
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	
——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官说”	贾洪波 (125)
春秋战国组玉研究	杨东明 (149)
徐州地区汉画像石的产生、发展与衰落	刘尊志 (179)
拓跋鲜卑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张国文 (201)
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再研究	刘 毅 (218)
关于米芾绘画及其临画乱真问题的辨析	李少龙 (264)
元青花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述评	袁胜文 (280)
王玉哲教授学述及其《中华远古史》评介	朱彦民 (302)
社区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黄春雨 (321)

鬼方考补正

王玉哲

最早研究鬼方历史的学者，当以王国维为最著。其所作《鬼方昆夷獠狁考》是以铜器铭文与古文献互相印证，对鬼方一族，钩稽索隐，创获颇多，使这一模糊的古老民族历史得以重现，其功不可没。但是，王氏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错误地把鬼方混同于獠狁和混夷，因而对鬼方一族的大小兴衰、出没地望，又造成一些值得重新商榷的问题。1945年余作《鬼方考》一文，对王氏所论已详加驳辩。关于鬼方活动的地域，王氏一则曰：“鬼方地在汧、陇之间，或更在其西，盖无疑义。”再则曰：“又在宗周之东，其北亦为鬼方境。”这样，忽而西忽而东，全不合实际。笔者曾提出五点证据，说明殷周时鬼方应在山西南部，战国末始北迁。那篇东西写于40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参考图书缺乏，环境极为艰苦，虽勉强成篇，但以今日的眼光视之，需要改正补苴之处尚多。今暂厘为两题，试略加补正。

一 甲骨卜辞中有无伐鬼方的记载

40年前我们曾说，甲骨文中“鬼方”一词仅一见。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甲骨契文已大量著录出版，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资料，远远超过以前。但有关“鬼方”的卜辞，仍是少得可怜。下面抄录有代表性的几条卜辞，然后再逐条加以讨论。

(1) 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田？五月。（《乙》6684；《合

集》8591)

(2) 己酉卜，内……鬼方易……𠄎？五月。(《甲》3343；《合集》8592)

(3) ……卜，𠄎贞：鬼方易……(《合集》8593)

(4) 壬辰卜，争贞：佳鬼，𠄎。

贞，不佳之𠄎。(《乙》3407)

(5) 允佳鬼𠄎周，𠄎。(《乙》3408，3407反)

卜辞中这一些“鬼方”或“鬼”应当就是文献上的“鬼方”。过去由于卜辞中仅一见，因而有谓卜辞中之“鬼方”非文献中之“鬼方”，认为卜辞中之“吕”与“鬼”同音假借，于是提出卜辞中的“吕方”才是文献中之“鬼方”^①。现在卜辞中有关“鬼方”的记载既然不止一见，而且大有逐渐增多之势，因而对卜辞中之“鬼方”即文献中之“鬼方”的看法，怀疑者已不多见。

承认卜辞中有鬼方，但是有无“伐鬼方”的记载，仍存有分歧。因为卜辞中没有对鬼方用“伐”或“征”的明显文句。只有“鬼方易”的“易”。这个“易”字过去有人以为是名词：有人名、族名、地名和方国名等不同的说法^②；还有的学者把“易”认为是动词，读为“颺”^③，或读为“扬”，谓“鬼方易的易作动词用，是说鬼方飞扬而去，言其逃亡之速，故下句以无咎为言”^④。

“易”字若作名词用，“鬼方易”三字绝对不会含有伐鬼方之义。但若作动词用，不管读“颺”或“扬”，都可以解释为：鬼方被征伐，于是飞扬逃跑。从卜辞整句看，鬼方逃去为“亡𠄎”，这就真如李学勤同志所说，“（鬼方）以有祸为正卜，表明商人是希望它们有祸的，它们都是商

① 林义光：《鬼方黎国并见卜辞说》，刊于中国大学《国学丛编》第一期第二册；董作宾：《论吕方即鬼方》，载其《殷历谱》下编；于省吾：《释吕方》，载于《双剑謄殷契骈枝三编》。于氏说：“且在已发现之契文中，不应仅此一见。”又说：“以契文吕方之方位及为患之剧考之，亦非吕方无以当鬼方。”

② 参见罗珣《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中所引。罗文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书局1960年版，第78页。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鬼方易》，中华书局1979年版。

的敌人”^①。上所录的第(1)至第(3)条卜辞很可能都是商王征伐它的敌人鬼方，而占卜是否没有灾祸的记录。

上引第(4)和第(5)条卜辞中的“𠬞”字，据于省吾先生说：“初义为以朴击蛇，引申为割杀之义。𠬞即《说文》𠬞字，经传假施为之。”^②后又训为“割解俘虏以为祭牲”^③，其说可信。卜辞中用牲及用人为牲，以𠬞的方式祭祀的颇多，如：

𠬞羊。(《存》1.1494)

贞，𠬞牛。(《戠》24.2)

贞，𠬞五牛。(《金》624)

𠬞豕。(《乙》2728)

癸亥卜，𠬞贞：𠬞羌百。(《续》2.29.3)

这几条卜辞大概即是用牛、羊或羌人作祭牲，以祀祖先鬼神求福佑的卜辞。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上引第(4)条“佳鬼，𠬞”，大概就是以俘虏鬼方的人为祭牲，第(5)条“允佳鬼𠬞周，𠬞”就是以俘获的鬼方和周人为祭牲。

根据前面这几条卜辞的句法，被“𠬞”的对象如牛、羊、羌人等大都置于“𠬞”字后面，而有关鬼方的第(4)条、第(5)条的“鬼”和“周”却置于“𠬞”字之前，所以有的学者对“佳鬼𠬞”和“佳鬼𠬞周，𠬞”中之“鬼”、“周”解释为“𠬞”祭的执行者，也就是说，“鬼”和“周”不是被“𠬞”的对象，而是躬行杀牲致祭的人^④。这种解释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按照卜辞辞例看，被“𠬞”的对象，可以置于“𠬞”字之后，也可以置于“𠬞”字之前，例如：

贞，𠬞人于章旦。(《拾》11.19)

①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

② 于省吾：《双剑谿殷契骈枝·释易》，1940年石印本。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𠬞》，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 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贞，人氏（岁）、𠬞于丁。九月。（《燕》241）

这两例句同是“𠬞”人以祭。第一例“人”在“𠬞”后，第二例则“人”在“岁”（刺杀）与“𠬞”（割解）之前。

另外，为了说明“鬼”为被“𠬞”的对象，我们不妨再举几条卜辞，以资证明：

辛卯……𠬞贞，佳𠬞乎竹𠬞𠬞。（《合集》1109 正）

……𠬞乎竹𠬞𠬞。（《合集》1111 正）

贞不佳𠬞乎竹𠬞𠬞。（《合集》1110 正；《存》1.616）

这三例中“𠬞”字后之字，笔者颇疑都是“鬼”字的异文^①。这就可以证明“鬼方”为商人的敌对者，故以其战俘为祭牲。

总之，前所录的五条有关鬼方的记载，都是商人伐鬼方在卜辞中的反映。也只有这样解释才与古文献记载相合。其中有“鬼方易”和“𠬞鬼”或“佳鬼𠬞”的卜辞都是属于一期卜辞，正是商王武丁时期。古文献《易经·既济》爻辞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个“高宗”，自周公（《尚书·无逸》）、孔子（《论语·宪问》）以来均认为是指商王武丁。这样，地下出土材料的记载，与古文献的记载如此一致，知其必为史实，而绝非偶然也。

二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如何解释

《易·既济》之爻辞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是指商王武丁对鬼方的战争，并已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商王武丁号称中兴之主，对鬼方的战争，需要经过三年才能取得胜利，则鬼方的强大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在武丁时的卜辞中，有关鬼方的记载却如此稀少。并且从武丁

^① 按罗琨的《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中曾引过一片卜辞：“佳𠬞乎竹𠬞𠬞”（《京》1434）。𠬞字下之字，更似鬼字。可是我们检阅《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原片，𠬞字下断缺，并无鬼字。故今未敢贸然取以为证。

卜辞中所反映的敌对战争、次数最多的是吕方、土方、羌方，而不是鬼方。所以，卜辞中的鬼方决难证明是“三年克之”的敌对大国。有的同志因此提出怀疑说：“卜辞中的鬼方即《周易》所称之鬼方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更进一步说：“据现有甲骨文资料，武丁时没有征伐过称之为鬼方的一个鬼姓邦国。”^①这种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那么，《周易》的“三年克之”到底怎么解释呢？

按《周易》爻辞说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般人认为这是说武丁与鬼方打了三年的战争，才把鬼方攻克。其实这种理解是很错误的。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两国交兵，绝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记载较翔实的殷末周武王在牧野克商的战争，是有名的大战。据史书记载，当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百人^②，甲士四万五千人与商纣兵七十万人（可能是十七万之误），战于牧野。战役也仅仅在“甲子”那一天一日而毕^③。甚至数百年后春秋时期的战争，也不是很大。《左传》所描绘的五大战役（韩、城濮、鞏、邲、鄢陵），我们脑中都有很深的印象，总觉得这五大战役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若仔细查阅史料原文，所谓五大战役，都只是一天就打完了整个战争。每次战役，其战车不过几百乘，兵众不过十万，战程不过一日。例如晋、楚鄢陵之战，据记载“旦而战，见星未已”，而楚军“乃宵遁”^④。这个春秋时有名的大战，也不过一天一夜。一直到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才逐渐增大，但也不过数月。如战国末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军相持于上党、长平，战线绵延一百几十里；战争始于四月，至九月赵军败降，前后持续也仅有五六个月之久^⑤。

从战国上推一千年的殷商时，武丁与鬼方的战争却说已有延续三年之久的大战役，这种说法，恐怕是绝对讲不通的。

① 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按虎贲即勇士。《周本纪》谓虎贲三千人，《尚书·牧誓序》作三百人。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当依《书序》以三百人为断。

③ 《史记·股本纪》谓周武王率兵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近出土的周初铜器《利簋》铭文有“武王征商，隹甲子朝”，日期与《史记》所述相合。

④ 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⑤ 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吾人生于两、三千年后，习见于近世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往往易于以今律古，把远古的小战役，错误地无限放大而不自知。所以，《周易》所载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句话，不是记载失实，就是另有其他解释。我们且推敲一下古文献的原文。

《周易》是这样记载的：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爻辞）

这两条爻辞行文古朴，我们绝无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有人说，“此两伐鬼方当非一时之事”^①。可是我们却认为应指同一事。所谓“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其中之“用”乃“周”字之讹。这是说殷高宗武丁时，震和周两个小方国，助商伐鬼方有功，得到大国殷商的赏赐^②。两爻辞都说到“三年”，问题在于这个“三年”与“伐鬼方”如何联系。绝不是打了三年的仗，已辨如前。那么“三”代表什么呢？

“三年”的“三”或者是古人习惯用语，《周易》卦辞、爻辞这种用法很多，是指大于“一”的泛称，不代表“三”的确数^③。“三年克之”并不是说商王打了三年的仗，才得胜利。但是，即便不是整三年，也必须是一年以上，才配得上称“三”。一年以上的战争，在殷商时仍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古史记录的体裁上考虑，才发现爻辞的“三年，克之”、“三年，有赏于大国”都是指商王的纪年，是说殷高宗武丁在位的第三年那一年，命周攻克鬼方。这才是这两条爻辞的确解。下面且作具体说明。

古代之史书，盖为文句极为简略、以事系年的编年体。现在我们所能

①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

② 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③ “三”的习惯用语例子，见于《周易》的，如“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三三不食”（《明夷》），“昼日三接”（《晋》），“田获三品”（《巽》），“三驱”（《比》），“三就”（《革》），“王三锡命”（《师》），“三岁不兴”（《同人》），“三人行”（《损》），“妇三岁不孕”（《渐》），“不速之客三人”（《需》），“三岁不得”（《坎》），“田获三狐”（《解》），等等。这些“三”字均属泛指，而不是“三”的确数。

见到的这类古史书，以孔子《春秋经》为最早^①。其体裁大概悉依鲁史之旧。吾等可借此以窥见古代所谓史，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公八年有一条云：“螟”）。这类史书在春秋战国间，各国都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②，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③，又称“百国春秋”^④。可惜这些史书，自秦灭之后，荡然无存。所幸西晋时汲冢出土一部《竹书纪年》。根据残存的《古本竹书纪年》看，这类史书的体裁，与《春秋经》大致相同，也是以事系年。今举殷商末年几条纪事为例：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注引）

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八十三引）

这和《周易》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行文极相似。《周易》这条爻辞的来源，可能就是采自这类编年的史书。上所举《竹书纪年》这三条纪事，是说周人伐燕京之戎是在大丁即位之第二年，伐始呼之戎是在大丁即位之第七年，周人伐商是在帝乙即位之第二年。大家公认这么理解是毫无疑义的。同样文例的《周易》爻辞，为什么不能把“伐鬼方”“克之”解释为是指殷高宗即位之“三年”的纪事呢^⑤？

《周易》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中的“三年”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条纪事也就可以确信无疑了。

最后，我们再谈谈与讨论鬼方问题有关的一条白组卜辞。罗琨同志引

① 比《春秋经》成书前的如《尚书》、《诗经》，时代虽然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还不能算史书。《尚书》是政府档案集，《诗经》是文学作品选。两书只可说是史料。

② 见《孟子·离娄下》。

③ 见《墨子·明鬼下》。

④ 《墨子》佚文，见《史通·六家篇》所引。

⑤ 这种编年形式又见《尚书大传》。记周公摄政有“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隋书·李德林传》，又《通鉴外纪》卷三引）。这里的“几年几年”也是编年史体，是指周公摄政的第几年那一年所做的事。

《殷虚文字乙编》403片，释其文为：“癸亥，贞旬。庚午鬼方受出（又）。”认为这是商王为鬼方求福佑的卜辞^①。鬼方既是商的敌对方国，为什么又为他求福佑呢？经我们查对原书，发现这条卜辞作以上释文是有问题的：第一，在这片卜辞中之所谓“鬼方”的“鬼”，模糊不清。如果我们参阅《甲骨合集》与此片词句相类的第20966片，就可以看出，此字似乎不是“鬼”而是“兄”字。第二，其中“受出”之“出”字也可疑。按“出”是卜辞中的常见字，据《甲骨文编》所辑的二十五个“出”字，其形下部大都作一横画，或横画稍曲。而此字下部作山形，可见，未必是“出”。第三，即便是出字，似乎也不能读为“鬼方受出”。因为从原拓看这个字明明是在罗氏所释的“鬼方”二字之上方。足证这条卜辞在释文和通读上，还应再斟酌。并且，就是采用罗氏读法，与我们对“高宗伐鬼方”的理解也不会构成矛盾。道理很简单，自组卜辞的断代，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赞成自组属武丁时代。至于在武丁的晚期还是早期，虽然尚有争论^②，但由于传说武丁在位年久^③，假如我们把这条卜辞置于武丁三年攻克鬼方之后，也仍然没有超出武丁早期的范围。鬼方自被攻克即服属于商，商王为其占卜求佑，又有什么不可呢？我们对鬼方这样一些理解，卜辞和文献的记载便完全相合了。

① 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主张自组卜辞在武丁晚期者有：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肖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兼论“自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年第4期。主张在武丁早期者，见林沅《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古史传说殷高宗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尚书·无逸》），或说五十五年（《史记·鲁世家》），或作百年（见《熹平石经》、《汉书·五行志》、《论衡·气寿篇》）。总之，武丁在位必在五十年以上。

试论藏品的搜集、管理、研究、利用 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

马子庄

无论研究代表世界意义博物馆萌芽的埃及亚历山大王宫的缪斯神庙，还是充满现实意义的美国宇宙航空博物馆，无数件藏品在博物馆发展中一直起着中流砥柱的基石作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博物馆学家斯特兰斯基曾经说过：“博物馆藏品已成为博物馆现实看法的结果。”当今时代，“到博物馆去藏博物馆的实物珍品”的概念在全世界观众中越来越深入人心。

在迎接博物馆发展新纪元的浪潮中，客观要求博物馆应建立在更加坚实、广博和具备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感情，对藏品的搜集、管理、研究和利用这样一个流水线似的博物馆藏品管理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和科学的理解。使经过科学管理的博物馆藏品真正成为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物质基础，真正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真正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本文拟就博物馆藏品的搜集、管理、研究、利用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做一些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拥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和自然标本，这为我国发展博物馆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博物馆搜集工作极好的前提。博物馆将这些文物和自然标本搜集起来，长期保存，并对其研究和利用，对于当代人民和子孙后代，对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本国文化遗产和宝贵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而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和利用还仅仅是开始。科学藏品搜集的

作用就在于，它使作为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典型物质和自然标本成为博物馆藏品，成为由博物馆负责保管、利用，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国家公共财产，从而更方便、更集中地发挥它们本身的历史见证和科学教育作用。世界上各大博物馆之所以闻名海内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文物、标本。藏品的数量多寡、质量高低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办得如何的标志之一，因为藏品制约着博物馆的一切业务活动，它是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科学研究，只有在搜集到足够数量和较高质量的文物和标本的基础上，才能开展；同时陈列展览内容的充实、更新和陈列展览质量及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必须由搜集工作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文物、标本，否则，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出来。

目前我国博物馆的搜集工作在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在目前博物馆亟须大发展的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博物馆科学搜集工作并未真正开展起来。前文虽然说过我国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自然标本，但目前保存在博物馆中的藏品总数却少得可怜，我国全部博物馆藏品总数仅略大于大英博物馆藏品的数量，这和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经费严重不足，全国博物馆事业一年的经费略等于大英博物馆一年的经费，其中用于搜集的经费就更少得可怜。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博物馆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单靠个别领导人的几次讲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在全国经济好转的形势下，对博物馆事业下大力气，多投资金，方能见到实效。

第二，作为藏品搜集的主要途径——馆际交换，在我国开展得很不活跃。作为调节馆际间藏品平衡的交换藏品，可以避免大量保留藏品的浪费和无所作为，这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互相协作的全盘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应该能够顺利进行。但目前馆际之间界限森严，完全被狭隘的本位主义所垄断，是亟须改变的。

当前，摆在我国博物馆工作面前的任务是要开创一个博物馆工作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博物馆。就博物馆建设本身来说，开创这个新局面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藏品的搜集和积累。博物馆本身乃是文物和标本的收藏机构，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藏品就不是真正的博物